

【學術報導】

新世紀海峽兩岸攜手共育敦煌學新才

——「二〇〇二年研究生敦煌石窟研習營」活動述評

王蘭平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博士生

—

由台灣「佛教圖像」研究後援會主辦，絲路佛教圖像文獻整合研究中心協辦的「二〇〇二年海峽兩岸研究生敦煌石窟研習營」活動，於七月十五至八月十五日在中國大陸成功舉辦。參加本次研習活動的十三位學員均為來自中國大陸、台灣、美國和英國高校的碩士、博士研究生。「佛教圖像」研究後援會會長郭英玉女士蒞臨指導，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先生對本次活動也給予了大力支持，並肯定了所取得的成績。

本次活動分兩個梯次進行，第一梯次由賴鵬舉先生率隊參加了由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主辦的「麥積山石窟藝術與絲綢之路佛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在會議期間考察了麥積山石窟、天水市內古跡景觀和慶陽北石窟寺等佛教文化遺址。會議結束後於二十三日前往新疆吐魯番進行學術考察，參觀了吐魯番市博物館、交河古城、吐峪溝石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二十七日到達敦煌莫高窟，開始營隊研習的準備工作。第二梯次學員則在郭祐孟先生帶領下於七月三十一日抵達敦煌與第一批次隊員會合。從八月一日起至十五日全體學員開始對敦煌石窟進行專題研習活動。八月八日參觀了敦煌西千佛洞，十四日晚上還參觀了鳴沙山和月牙泉。十六日，營隊學員離開敦煌，部分學員在老師帶領下前往西安，於十七、十八日兩天參觀了西安市博物館、碑林博物館和耀縣博物館。十九日全部研習活動結束。

本次活動課程安排採取上午看窟、下午專題講座和晚上小組研討三種方式結合進行，在為期半個月的集訓中，學員們按年代順序考察了八十餘個莫高窟的代表性洞窟，聽取了十三場專題報告。進行授課的老師有敦煌研究院的樊錦詩、賀世哲、李正宇、彭金章、殷光明先生和台灣地區的賴鵬舉、潘亮文、郭祐孟先生，他們分別就敦煌莫高窟考古、敦煌史地、佛教圖像和佛教禪法、義理等幾個重要主題進行報告，受到學員的普遍歡迎和好評。下面我就對十三個場次報告的主要內容做一回顧。

二

考古學對敦煌學發展之基礎性作用早已為學界所公認，忽視或缺少對石窟考古研究成果的吸收，就難以建立石窟內容與時空背景。鑑於此，研習營邀請了兩位對敦煌石窟考古有著重要貢獻的專家為學員開設這方面的講座。

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先生首先作了「莫高窟洞窟分期的方法與成果」為主題的報告。樊先生考慮到學員的知識結構和學習要求，對在解決莫高窟洞窟分期問題上起重要作用的考古學作了簡明扼要的說明。她說，考古學是一門通過對古代留下的遺物和遺址進行調查、發掘和研究來探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屬於歷史學的範疇，但又有自身獨立的方法論。由於考古學是一門涉及面很廣的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科學都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判斷遺存年代也必須採用多種方法，但最基本的方法是利用層位學和類型學的研究。將考古學具體應用到洞窟時代研究中則主要從兩個方面來進行：一方面，大量沒有紀年的洞窟，採用類型學和層位學的方法，對洞窟形制結構、彩塑和壁畫的題材布局、內容等區分為若干類別，分類進行型式排比，排出每一類型自身的發展系列，又作平行各類型系列的相互比較，從差異變化中找出時間上的先後關係，將類型相同的洞窟再進行組合，從雷同相似中找出時間上的相近關係，並以遺跡的疊壓層次關係，綜合判斷洞窟和其彩塑、壁畫的相對年代。又以有題記紀年的洞窟作為標尺斷定其絕對年代，採用這種方法，不僅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代、唐前期、唐後期、回鶻、西夏等時代洞窟的分期斷代；特別排比出北周、回鶻的一批洞窟，而且還揭示了莫高窟洞窟發展演變的規律和時代特徵。以同樣的方法，對莫高窟北周時代的洞窟作更進一步的分期排年，找出十餘個洞窟年代上的先後關係。對莫高窟中心塔柱除作分期和年代的探討外，還通過縱向和橫向比較，探討此類洞窟的淵源和性質。另一方面，依靠洞窟題記、敦煌文書、碑銘結合歷史文獻，作了深入細緻地探討校訂。相當一部分洞窟的具體修建年代、敦煌石窟年代研究的學術成果，不僅解決了洞窟本身的年代，而且還為敦煌石窟各項研究提供了時代的依據。這些成果都是我們開展石窟研究的基礎，今天的敦煌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直接、間接地使用著這部分成果。

敦煌研究院彭金章先生作了「敦煌莫高窟北區的考古」報告。首先，彭先生對考古前的北區石窟概況作了介紹，他說，北區崖面長七百餘米，開鑿洞窟數百個，其中僅有五個石窟敦煌文物研究所進行了編號和記錄，其餘洞窟因多無壁畫和塑像，也就一直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在講到北區石窟現狀及形成原因時，彭先生認為北區也和南區崖面所開鑿的石窟一樣，彼此上下相接，左右毗鄰，狀如蜂巢。崖面石窟最密集處上下可達五層或六層，亦十分壯觀。千百年來，由於自然和人為的原因，北區崖面及石窟內部已遠非當年的原貌。大泉河水的泛濫、驟降的暴雨以及突發的地震，是莫高窟北區石窟遭到破壞的自然因素，而外國探險者和國人的亂挖亂掘，大肆攫寶，則是北區石窟遭到破壞的人為因素。其中洪水和暴雨對崖面的沖刷，是造成該區石窟崩塌的最主要原因。之後彭先生談到了自一九四四年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以來到一九八八年前對北區石窟的保護研究工作，認為保護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

績，值得肯定，但研究工作相對滯後，需要加強。鑑於此，自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五年前後，他主持進行了六次系統的科學考古發掘工作，除對北區洞窟進行清理和資料收集外，還發現了一些被掩埋的洞窟和重要的遺物。通過窟區全面清理，探明了洞窟的數量、分布、類型，分析了作為僧眾生活、修行、埋葬的僧房窟、禪窟、瘞窟、禮佛窟和廩窟等不同形制洞窟的結構特點、性質、作用，每個或每組洞窟的使用狀況及其時代。最後彭先生總結到，北區洞窟的功能與南區有別，南區是佛的殿堂，又是僧俗禮佛的場所；北區則主要供僧眾生活、居住、習禪和死後瘞埋。南北兩區洞窟群合在一起才構成了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

對敦煌史地的必要瞭解是我們認識敦煌、讀懂敦煌歷史文化所不能缺少的知識儲備。為此研習營邀請了資深研究員李正宇先生作「古代敦煌的史地」主題報告。首先，李先生對敦煌的地理位置與環境作了詳細介紹。認為黨河是敦煌農業、工業及人畜用水的主要水源，沒有黨河就沒有敦煌，更不會有燦爛的敦煌文化。可以說，黨河就是敦煌的母親河，是敦煌的生命之源。同時敦煌地處亞洲大陸腹地東緣，屬於大陸性氣候，乾旱少雨和溫差對比明顯是其兩個重要特徵。氣候的乾燥決定了敦煌必須高度重視引水灌溉，所以從古到今敦煌的水利事業一直很發達。敦煌遺書中反映這方面的記載也很多，水利問題的研究，也就成為敦煌歷史、地理、社會、民生、民俗以及城鎮村莊的形成、道路交通的變動、生態之變遷等各項研究的基礎性課題之一。李先生還分析了敦煌溫差對比明顯的九種情況，在此基礎上指出溫差大對人們生活帶來的利弊。溫差懸殊會給人民生活造成諸多不便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但掌握了其變化規律後也可以趨利避害，如晝夜溫差大就十分有利瓜果的生長和糖份的聚合，敦煌以「地產美瓜」而聞名就是這個原因。本場報告的另一主題是關於敦煌郡、縣、鄉、里的形成過程。李先生介紹到，西漢初期，敦煌地區是匈奴的領地，實行軍事奴隸統治，無郡、縣及鄉、里建制。漢武帝元狩二年（西元前一二一）匈奴渾邪王降漢後，河西分置武威、酒泉二郡。從此敦煌一帶被納入漢朝版圖，開始設縣，隸屬酒泉郡。元鼎六年（西元前一一一），漢庭析酒泉郡地置敦煌郡。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時期敦煌郡轄有敦煌、冥安、效谷、淵泉、廣至、龍勒六縣。西晉以來，縣以下改置諸鄉，鄉下置里，里率民戶。魏晉南北朝時期，敦煌地區六縣又屢有分合，敦煌郡名也先後改稱沙州、瓜州。到了唐代，原敦煌郡分置瓜、沙二州，瓜州下轄有晉昌、常樂二縣；沙州下轄有敦煌、壽昌二縣。李先生認為敦煌郡、縣、鄉、里整套建制的形成反映了敦煌社會進步的迅速，而這種快速進步是由漢朝軍隊的進駐接管所帶來的，可以說，漢朝軍隊的進駐接管結束了敦煌遲滯落後的狀態，揭開了敦煌進步繁榮的新篇章。

對敦煌石窟圖像的研究一直是敦煌學研究兩大主題之一，學界已經在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這些都將是我們今後開展敦煌石窟文化研究的基礎。為此邀請三位著名學者作了四場次的報告，他們或從美術史角度對石窟內單尊或單鋪造像進行多角度研究；或選擇一特定圖像主題，將其放置於整個時代背景下進行立體式的考察；或將圖像結構與石窟功用進行結合研究，總的說來是各有特色，互為補充。

敦煌研究院賀世哲先生作了題為「敦煌金剛經變」的報告。賀先生首先對《金剛經》在漢地的流傳情況作了簡要介紹，指出《金剛經》有六種漢譯本，其中以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最為流行。此經是般若類經典中出現最早，影響最大的佛典，其思想可以「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來概括。其次對敦煌壁畫所存之金剛經變作了總體說明，指出現存的十七鋪金剛經變中，有十三鋪繪於吐蕃佔領敦煌時期，另外四鋪繪於張氏歸義軍時期。這些金剛經變都是依據鳩摩羅什譯本而繪製的。同時在談到敦煌金剛經變出現的歷史背景時，賀先生認為敦煌禪學從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最後，賀先生結合幻燈片對敦煌所存十七鋪金剛經變的題材內容、構圖形式作了仔細的講解，為學員總結出判斷金剛經變的幾個帶有標誌性的畫面，認為只要有舍衛城乞食、比丘講《金剛經》、供養塔廟、歌利王本生和被人輕賤等場景，基本上就可以斷定為金剛經變。

台南藝術學院潘亮文副教授作了兩個場次的報告，第一場次題為「初期至唐代的敦煌文殊菩薩造像初探——以文殊變的內容為中心」。首先，潘先生根據敦煌石窟內容並結合藏經洞出土文獻，按時代順序對敦煌文殊變作了系統的整理工作。在此基礎上，總結出各個歷史時期敦煌文殊菩薩像的特徵和流行情況。他認為在初期，如西魏二八五窟東壁門北作品所呈現的，文殊菩薩是無量壽佛說法中的一尊護持菩薩，文殊菩薩的形象與其他菩薩並無太大的差異，由此推測此時文殊菩薩的尊格特性並不明顯。自初唐起，以文殊菩薩為中心所組成的文殊變與普賢變多配對出現在西壁龕外或南、北側，這樣的發展一直延續到整個唐代。但初唐時期的文殊變，以三三一窟為例，是以搭配西壁的九尊塑像而存在的，同時內容簡單，所以認為此時將文殊變進行單獨創作的意識尚未形成。同時文殊變之構圖形式也沒有一定的規律，構件之要素也沒有固定，這種現象正可說明初唐時期的敦煌文殊菩薩造像並不發達，文殊菩薩信仰亦尚未興盛。盛唐時期，文殊變出現的位置有仍在西壁龕外，也有在東壁門側的情況。因畫面空間大小與構圖形式關係密切，所以文殊變出現在東壁門側，也意味著文殊變圖像有成長的空間，文殊菩薩、獅子、牽拉獅子的昆侖奴成為識辨是否為文殊變的圖像特徵。但從中唐時期文殊變中諸隨眾尚未完全成形來看，這或可說明盛唐時期敦煌文殊信仰尚未完全深植於民眾。中唐時期文殊變的構成要素——文殊菩薩、獅子、牽拉獅子的昆侖奴、隨侍（天王、力士、大菩薩與供養菩薩等），基本上已經形成固定的模式。依據此時期文殊變圖像內容的發展過程，可以說文殊變的構圖形式已經確立，並呈固定化發展趨勢。同時，出現了不見於前期所謂的五台山圖。同時山水雲彩的表現也較前期豐富多樣，可見其重要性已相對提高。晚唐時期的文殊變，無論是從其出現的位置或作品本身的組合要素，乃至洞窟形制與構圖內容的關係等來看，皆是延續中唐發展而來。且同一洞窟多出現排列順序、構圖形式等與普賢變幾乎對稱的文殊變作品，由此推測晚唐時期敦煌地區的文殊變在構圖上已經形成固定的模式，這種現象正可說明文殊菩薩信仰已有了一定深入的發展。

潘先生做的另一場報告題為「敦煌地藏菩薩像初探」。眾所周知，地藏菩薩是佛教四大菩薩之一，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隨著地藏菩薩信仰的流行，歷史上曾出現過許多地藏菩薩像，其在宗教和藝術上都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因此潘先生選擇敦煌地藏菩薩像為研究重點，

對其構圖特點、圖像變化所折射出來的問題作了深入的闡釋。首先，透過對漢譯經典中地藏圖像的分析，認為其主要是以沙門形象的地藏像為主，這與現存地藏像作品所呈現的特點也相一致。同時，通過對作品的分析、綜合與歸納，可以知道敦煌地區的地藏造像約肇始於初唐時期，主要以單尊、手持如意寶珠的沙門形造像為主。這種如意寶珠持物一直延續至五代、宋，可以說是最典型的地藏像持物。盛唐時期，地藏菩薩除了前期所見形象外，也多出現以手結印契的情形，這種表現恐怕與密教重印契思想有一定關係。同時，盛唐時期也有手持錫杖的地藏像出現，但這樣的表現形式不多見，可以說只是處於萌芽階段而已。直到中唐後，這種造型的地藏形象依然僅限於少數作品，錫杖成爲地藏像特有形象應該是到了五代以後才開始的。此外，在中唐時期的地藏作品中有了六道的構圖，這充分表現了地藏菩薩解救六道眾生的思想。在地藏與六道信仰結合的基礎上，晚唐時期又加入了地獄十王的觀念，其漸漸發展成爲地藏、六道與十王的組合，而此三者所形成的構圖模式在五代時期達到了鼎盛的局面，同時也演變成爲一種固定的樣式。同時從善惡童子、道明和尚、獅子等形象的加入也可以說明疑偽經與民間傳說對地藏作品的形成也產生過相當大的影響力。

敦煌研究院殷光明先生作了題爲「由疑偽經看敦煌壁畫藝術的中國化」的報告。殷先生今年七月份剛剛從蘭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本場報告的主要內容是其博士論文〈敦煌壁畫藝術與傳統文化——以疑偽經爲中心〉的濃縮和精華。首先，殷先生對涉及本主題之「疑偽經」作了內涵與外延的界定，指出疑偽經主要是「以歷代經錄爲依據，對一些被學術界懷疑爲偽經，或有明顯作偽現象的佛經」。在此基礎上，主要以敦煌經變畫爲主，對壁畫藝術與傳統神話題材、敦煌石窟中之地獄圖像與冥報思想作了詳細的闡釋。殷先生認爲在佛教傳入之前，中國已經形成了本民族的宗教思想和神學理論，並創造出了自然崇拜的神靈和民俗信仰的諸神圖像。佛教作爲一種外來宗教之所以能成爲中國的民族宗教，正是適應和吸取了中國傳統的民間宗教內容。從敦煌石窟中一些中國神話傳說題材就可以看到本土信仰是如何融入與改造外來宗教並將之蛻變爲中國文化的歷史現象。關於地獄圖像與冥報思想，殷先生認爲，「中國地獄思想源自印度佛教。自佛教傳入中國後，其與傳統文化經過長期的融合、滲透，到五代、宋時期已經形成了具有中國特性的冥報思想。敦煌石窟中出現的地藏菩薩、十王經變、目連變相所表現出來的冥報思想就是傳統文化中的神鬼思想與印度佛教中的天堂地獄思想相互融合的結果。」

台灣空中大學郭祐孟先生作了題爲「敦煌密教窟的圖像結構及其體用觀——以莫高窟晚唐十四窟爲中心」的報告。敦煌密教窟的研究一直是敦煌石窟研究中的難點和弱點，郭先生在此方面提出了一種新的石窟解讀方法，正如他所指出的：「他要就密教窟的圖像結構，參酌觀行儀軌及其所根據的禪法系統，做一段圖像義理與密法操作間的對話。」首先，郭先生從總體上對十四窟的石窟結構和窟內造像作了概要性的解說，在此基礎上對此窟主室圖像結構進行了仔細的考察，認爲就中心佛壇與東、西壁造像角度觀察，「以中心佛壇上的主佛及化佛統攝南北側面的藥師、彌勒經變，構成了十方三世佛的總體。依東壁門上的二佛並坐與西壁千佛說明法脈傳薪的燈燈無盡，藉三世的段演來展現法、報、化三身的不一不異。東壁

門之兩側的文殊、普賢變則可結合中心主佛做三聖圓融觀法，視為智法界與理法界的統合。從總體上看，本窟中軸線圖像結構是全窟一切理觀和密法的背景」。如從中心佛壇、窟頂與南北壁造像組合觀察，就「中心佛壇與窟頂的圖像結構」而言，「窟頂垂幔內的圖像結構基本上承襲早期中印度四方佛系統，但似乎也預告著後代敦煌密教窟窟頂以中印度五方佛圖像為主體的發展趨勢。垂幔外的東、南、北三披可視為四方佛的表現，若將垂幔內外諸佛分別稱為四方佛和十方佛，則也是可行的。這樣就進一步將四方佛與十方佛加以聯繫，可以說是把中印度的四方佛說及華嚴的十方佛說連結起來了，本窟窟頂或也代表著這種趨勢下所產生的結果。」此外，郭先生還對西披塔剎提出了新的觀點，恢復了十四窟窟頂的原貌。之後，郭先生講到「南、北壁的密教曼荼羅對應結構」應該是金剛母與金剛薩埵對應；十一面觀音與觀音經變對應；不空羼索觀音與如意輪觀音對應；千手眼觀音與千手鉢文殊對應。因此從整體上說，十四窟是以華嚴、法華思想主導的「十方三世佛觀」為顯、密共遵的理體，而以觀音、文殊、普賢之別尊曼荼羅法是為適應因緣變化的方便進道密要。最後郭先生以「金剛薩埵法、不空羼索觀音法、如意輪法、千手眼觀音法、千手鉢文殊法」為例對本窟的體用觀作了解析，認為從對十四窟結構的解讀上是可以體會到外觀圖像與內觀意象之間微妙聯繫的。

本次研習活動課程安排的第三個主題是「佛教義理與禪法」。近年來，台灣圓光佛學研究院的賴鵬舉先生在這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作為本次學習的一個重點內容，共安排了賴先生五個場次的報告，考慮到它們之間的關聯性，我將其放在一起介紹。

第一場報告是「北涼以『十方三世』為內涵的『涅槃』思想、禪法與造像」。賴先生首先從「北涼石塔」內容中尋找出北涼佛教「十方三世」、「涅槃」及「中心塔柱」等三個討論主題；接著結合石塔與酒泉十六國墓室造像內容說明北涼佛教「十方三世」思想的形成過程；之後進一步由涼州當地譯經及高僧來瞭解北涼佛教如何由「十方三世」為內涵進一步形成其「涅槃」義學與禪法；最後則以北涼流亡政權在高昌吐峪溝所開鑿的四十四窟來說明「十方三世」思想主導下的具體造像。通過對以上問題的分析，認為北涼佛教由傳統文化「上圓為天，下方為地」的宇宙觀與宗教觀出發，並進一步從阿富汗與長安佛教中接受了「十方佛」與「三世佛」的思想與禪法，並在自身「涅槃學」的指導下將兩思想合為一更大體系的「十方三世」思想，且行之為禪法、密法及石窟的造像，這是中國佛教第一次形成體系如此龐大的禪法，它主導了爾後中國禪法的主要發展方向。

賴先生作的第二場報告是「以敦煌造像看北朝佛教由涅槃『白衣佛』到華嚴『盧舍那佛』的轉變」。首先，賴先生認為從敦煌北朝石窟的形制及各壁造像內容上看，其大多屬於「涅槃窟」，但正室主尊並非是中心柱前面龕內的造像，而是正室西壁的主尊——「白衣佛」。之後，他對莫高窟「白衣佛」的出現及其產生原因作了具體的解釋，認為「白衣佛」出現在北魏以「涅槃」造像為主的中心柱窟內，其原因是五、六世紀造像背後思想由《十住經》擴大至《華嚴經》而引起的。這表現在造像上就需要另立一尊代表整個法界至尊的「盧舍那佛」，因此就在一般佛像身上加上王者的裝飾，如寶冠、披肩等來顯示這種變化。北魏四三五窟「寶冠佛」之出現代表著「涅槃」思想在北朝時的發展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也為稍後北周

四二八窟「佛衣盧舍那佛」介入涅槃窟埋下了伏筆。而從北周四二八窟南壁出現之代表華嚴系主尊「盧舍那佛」來看，我們可以看到此時莫高窟造像由涅槃系逐漸被華嚴系吸收、取代的過程。但這種取代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唐之前，「盧舍那佛」與「白衣佛」還多在莫高窟中同時出現。直到中唐榆林窟二十五窟正壁正式出現寶冠盧舍那佛造像及「清淨法身盧舍那佛」題記後才最終完成這個取代過程，前後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

賴先生作的第三場報告是「東魏北齊以『佛衣畫』為主的『盧舍那佛』造像、銘文與思想」。正如上述第二場報告所揭示的那樣，敦煌佛教造像由「涅槃」一系轉變到「華嚴」一系的發生時間是在北朝，因此選擇東魏、北齊之「佛衣畫盧舍那佛」來探討其造像及思想就顯得非常有意義。通過對東魏、北齊盧舍那佛衣造像的細緻分析，賴先生認為此類造像相對突顯「十道眾生」的內容，表示源於中亞《十住經·法雲地》的須彌山世界及十道眾生造像在進入中國後有偏重後者的趨勢。且由震旦文教基金會所藏佛衣造像的具體內容中可以看出其「十道」造像中「人道」與「地獄道」的比例偏多，故北齊的盧舍那佛衣造像除影響初唐杜順「法界觀」的形成，亦為爾後唐代敦煌石窟造像及絹畫中「報恩經變」與「地獄變」埋下伏筆。

賴先生作的第四場報告是「唐代莫高窟的多重華嚴『盧舍那』結構」。賴先生認為華嚴思想自北周開始進入莫高窟起，進入隋唐時期的敦煌莫高窟華嚴造像，出現了以華嚴經義為主的多樣性內容，且每樣內容與石窟主尊的結合，單獨皆可定義主尊的「盧舍那」性格，因而形成唐代莫高窟的多重「盧舍那」結構，即有周壁為「十方三世」造像；兩側壁一邊為代表「三世」的彌勒淨土，一邊為代表「十方」的彌陀淨土；正壁主尊兩側或入門兩側有《華嚴經》的二位上首菩薩。之後，賴先生逐一對上述多重「盧舍那」結構的形成過程及涵義作了解釋。首先，認為在「涅槃」思想基礎上形成的「十方三世」佛觀出現在唐代以「華嚴」為主要造像思想的莫高窟洞窟中，其原因可以用華嚴「法界觀」來解釋，正是華嚴一宗對「十方三世」的持續開展提供了莫高窟窟頂的「十方佛」與四壁的「三世千佛」在唐代以後持續存在的基礎。其次，賴先生尋找出了唐代華嚴學對「彌勒」和「彌陀」兩淨土含攝的內涵。最後，從莫高窟「華嚴三聖」造像與中唐澄觀「三聖圓融觀門」之關係來解釋唐代、五代莫高窟文殊、普賢菩薩與主尊佛結合所體現出來的「盧舍那」華嚴義學本質及禪學之背景。賴先生借助對石窟主尊屬性的定位，確實為我們進一步研究佛窟造像指引出了一個新的方向。

賴先生作的最後一場報告是「由敦煌莫高窟六十一窟看五台山文殊道場的形成」。隨著敦煌學研究的日益深入，把敦煌文獻與石窟藝術結合起來將是未來敦煌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賴先生作的本場報告就是開展這方面研究工作的有益探索，不管我們對其所得到的研究結論是否同意，但這種研究理路確實向我們展示了敦煌文獻與石窟結合研究所帶來的光明前景。首先，賴先生分析了唐代五台山文殊思想興起時的佛教思想背景，認為五台山的造像與思想歷來是以「華嚴」思想為主的。其次，向學員展現了文殊信仰的發展軌跡，從文殊開始作為釋迦佛的一位脇侍，到初唐時期朝禮五台山文殊菩薩風氣的流行，至文殊最後登上殿堂主尊的位置，有一個漸次發展的過程。之後，分析了這種發展過程背後的原因，認為文

殊在華嚴思想背景下地位的提昇得依於曇摩流支所譯《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經文中因藉文殊對「法身」境界的請問與闡發，令文殊的地位幾乎與華嚴法身「毗盧遮那佛」等同起來。唐代敦煌佛教亦是以「華嚴」為主流思想，晚唐以來流行於敦煌的禮懺文《文殊法身禮》採擷了上述《入一切佛境界經》中文殊的偈頌，形成《法身禮》的主體，而所禮的對象即在華嚴的法、報、化「三身」之外，另加入了「文殊菩薩」，終於讓文殊登上了懺儀殿堂主尊的位置，這便是敦煌六十一窟的情形。從敦煌寫本《文殊法身禮》結合六十一窟之造像結構、思想背景、空間結構及懺儀空間看，敦煌佛教中的文殊思想發展狀況與《文殊法身禮》所產生的影響是互相平行的。

賴先生在上述五場報告裏，以造像時間為經度，對北朝至隋唐以來的莫高窟造像背後所體現出來的佛教義理、禪法作了一次系統、綜合的研究，揭示了該歷史時段莫高窟造像的整體內涵。這種研究理路確實我們以後研究石窟造像開啓了一個新的方向。

三

敦煌石窟藝術一直是敦煌學研究的重要內容，目前學界對此主要從石窟考古與歷史，石窟造像內容、特點以及造像背後的經典、思想和禪法等三個不同層面來開展研究工作，但要對敦煌石窟形成全面性的理解則必須將三者有機結合，在以前研究敦煌石窟的年輕學者中，有些雖也親自參觀了石窟，但因不瞭解石窟造像內容及造像背後的含義而受益有限；有些雖有瞭解但流於片面，故難以結合上述三種層面形成全面性的認識，收效不大。敦煌石窟研究的日益深化和綜合化發展趨勢，對從事該領域學術研究的年輕學者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鑑於這種情況，將課堂選在莫高窟，在現場觀察的基礎上，由考古、造像與禪法三方面專家聯合對學員進行全面授課是目前培養佛教石窟藝術研究人才的最佳方式之一。本次研習活動的主辦單位台灣「佛教圖像」研究後援會是一個以推動佛教研究，培養年輕佛學人才為宗旨的民間基金組織，多年來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協辦單位台灣絲路佛教圖像文獻整合研究中心也是一個以絲路佛教造像為研究重點的學術機構，近年來在該領域取得了一系列令學界矚目的研究成果。在新世紀裡，由以上兩家單位聯合舉辦的「敦煌石窟研習營」活動不僅加強了海峽兩岸學術研究資訊交流，而且對培養兩岸年輕佛教藝術研究人才有著特殊而重要的意義，因此值得予以充分的重視和肯定。

作者後記

本次研習活動，筆者有幸得到台灣「佛教圖像後援會」基金的全額資助而得以參加，我首先要對基金會為培養海峽兩岸佛教圖像研究人才所做出的善舉表示由衷的敬佩。

在隨營學習的近一個月時間裡，指導老師給予了我們生活上無微不至的照顧和學術研究上的悉心指導。整個營隊的活動始終是在緊張、有序、嚴肅、活潑氣氛中開展的，這是本次活動取得成功的重要條件。對此，我要對主辦單位為此所作的艱苦努力表示衷心感謝。

每每憶及在敦煌學習的那段難忘時光，倍感師生、同胞手足之情深，友誼之珍貴。作為本次學習活動的一個簡要總結，綴此小文，為的是紀念那段難忘的美好時光。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是國家教育部百所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之一，基地自成立以來在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培養年輕學術人才上一直不遺餘力。近年來該所同「絲路佛教圖像文獻整合研究中心」保持著良好的學術交流活動，主辦單位全額資助該所選送的三名博士研究生參加本次研習活動就是兩單位在人才培養領域內的第一次友好合作。相信美好的因緣一定會成就不平凡的事業。

本文寫作過程中，參看了賀世哲、李正宇、賴彭舉、潘亮文、郭祐孟先生的授課講義，此外還參考了其他授課老師以下相關論著：

(一)承蒙殷光明先生贈送〈由疑偽經看敦煌壁畫藝術的中國化〉講稿，在寫作時得以參考。同時又參考了其博士論文「敦煌壁畫藝術與傳統文化——以疑偽經為中心」，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蘭州大學資料中心庫藏。

(二)樊錦詩、馬世長、關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收入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中文版第一卷（文物出版社、株式會社平凡社，一九八二年）第一八五—一九七頁。又見收入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甘肅民族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一—二十八頁。

(三)樊錦詩、關友惠、劉玉權，〈莫高窟隋代石窟的分期〉，收入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中文版第二卷（文物出版社、株式會社平凡社出版，一九八四年）第一七一—一八五頁。又見收入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甘肅民族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一一二—一四二頁。

(四)樊錦詩、劉玉權，〈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分期〉，收入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甘肅民族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一四三—一八一頁。

(五)樊錦詩、趙青蘭，〈吐蕃佔領時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收入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甘肅民族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一八二—二一〇頁。

(六)參考了彭金章、王建軍，《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一卷「前言」第一節〈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概況〉和「結語」上部分，分別為第一—十、第三三八—三五—一頁（文物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參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彭金章執筆的「莫高窟北區」條（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十一頁。

(七)賴鵬舉，「絲路佛教的圖像與禪法」，列印本。

(八)賴鵬舉、郭祐孟、賴文英、王麗娟合著，「莫高窟現場考察手冊」，列印本。